

# “控制辩证模式”： 信息传播新模式的发展与转向

韦路 方振武

##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博德维克和范·卡姆从“控制”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信息传播新模式。经麦奎尔与温德尔, Jensen, 以及McMillan等人的介绍、引用或改进,信息传播新模式得以为学界所熟知。然而,信息传播新模式及其之后的发展并未考虑新媒体环境中个体角色的变换及其理论意涵。从吉登斯的“控制辩证法”来看,个体与媒介中心之间的控制关系是双向的,当个体能够控制媒介中心之时,媒介中心亦能够实现对个体的新的控制。因此,我们提出“控制辩证模式”来展现这种互动性,以求更加准确地阐明个体与媒介中心之间的复杂关系。

## 关键词

传播模式、控制辩证法、权力关系、媒介生产、受众

## 作者简介

韦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电邮: [drluwei@zju.edu.cn](mailto:drluwei@zju.edu.cn)。

方振武,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电邮: [fangzhenwu@outlook.com](mailto:fangzhenwu@outlook.com)。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优势学科重大委托课题“大数据时代中国形象研究”(项目编号:16YSXK01ZD)成果。

## Dialectic Model of Control: The Development and Shift of New Pattern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WEI Lu, FANG Zhenwu

## Abstract

Jan L. Bordewijk and Ben van Kaam came up with the New Patterns of Information Traff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ol” in the mid-1980s, and this new model got well known by the academia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r citation by scholars like McQuail and Windahl, Jensen, and

Mcmillan. Thesenew patterns and their subsequent development, however,have not considered the changing roleof individuals in a transforming media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iddens’s Dialectic of Contro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media center is two-way. When individuals are able to control the media center, the latter will find new ways of controlling the former. Therefore, we develop a “Dialectic Model of Control” to capture such reciprocity and to illustrat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media centers.

Keywords

communication models, dialectic of control, power relationship, media production, audience

Authors

Wei Lu,professor, 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at Zhejiang University. Email: drluwei@zju.edu.cn.

Fang Zhenwu, doctoral student, 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at Zhejiang University. Email: fangzhenwu@outlook.com.

This paper is financed by the Key Research Project of Zhejiang Province Social Sciences Fund "China Image Research in the Big Data Era" (Project No.16YSXK01ZD).

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1864–1920）提出的“理想类型”（又译“理念类型”，idea type）概念，旨在克服德国人文主义和历史学派过度个体化和特殊化的倾向，其意不在概括现实事物的所有特征，而是单向侧重概括事物的一组或某种特征，从而使比较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拥有共性的现象成为可能（周晓虹，2002）。博德维克（Jan L. Bordewijk）和范·卡姆（Ben van Kaam）某种程度上沿袭了韦伯的“理想类型”思想，在“Towards a new classification of tele-information services”（1986/2003:576–582）一文中，他们从社会的和法律的地位出发，以“控制”思想为核心，构建了信息服务的四种理想类型（见表1）。在此过程中，两位作者重点关注了两个问题：（1）信息是由信息中心发布，还是由用户发布，即信息发布的控制权在谁手中？（2）信息的发布程序（时间控制和主题选择）是由信息中心控制，还是由用户控制，即什么时候发布和发布什么样的内容的控制权在谁手里？

表1 信息传播新模式（Bordewijk & van Kamm，1986/2003： 580）

	中心发布信息	用户发布信息
中心控制发布程序	训示（Allocation）	注册（Registration）
用户控制发布程序	咨询（Consultation）	对话（Conversation）

博德维克和范·卡姆的这篇文章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以来，经过麦奎尔和

温德尔（1993/2008）、Jensen（1999）、McMillan（2002）和Meikle（2002；转引自:Spurgeon,2005）等人的引介和改进后，不断地为学界所知晓。在围绕信息传播新模式展开的学术对话中，学界逐渐意识到个体的信息控制权概念中谈及却未被充分关注的信息发布权问题，即个体在特定范围内——诸如聊天室、微信群、网络论坛、评论区等封闭性或半封闭性空间中——进行的信息发布实践。而且，按照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控制辩证法”思想，个体是具备“改变”能力的行动者，他“能够介入、干预这个世界，或是能够摆脱这种干预，同时产生影响事件的特定过程或事态的效果……能够（在日常生活流中周而复始地）实施一系列具有因果关系性质的权力，包括那些影响他人所实施之权力的权力”（吉登斯，1998:76）。所以，从理论的层面来看，在“媒介中心—个体”的权力关系中，个体是能够主导信息控制权的。传播技术的局限、“参与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与“赋权”（empowerment）功能的被忽视等是导致个体信息控制权，尤其是信息发布权，未被充分关注的几个主要原因。因此，当传播技术发生变迁、参与文化崛起、赋权功能进入新媒体研究的视野之后，个体的信息控制权，尤其是信息发布权，开始真正成型。当然，关于个体的信息发布权，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主要限于对媒介中心的信息补充和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两个路径，较少从“媒介中心—个体”的权力关系关注这一问题。有鉴于此，我们在控制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传播模式——“控制辩证模式”，希冀更为完整地说明信息传播新模式中已经涉及，而其后改进模式未能充分关照过的“媒介中心—个体”的权力关系问题。事实上，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早就一方面积极地肯定了信息传播新模式的存在（麦奎尔&温德尔，1993/2008；McQuail,2013a），另一方面也认为，提出一个新模式的时机已然成熟，这样一个新模式将具备非线性、互动性、非决定性、弹性、个体性及传播方向的自由等特征（McQuail,2013b）。此外，这种新的模式即便不是从替代信息传播新模式的意义上而言，至少也能从比较的视野来获得应有的关注（McQuail,2013b）。

当然，控制辩证模式的建构有赖于以下过程：（1）系统地说明信息传播新模式是我们的学术对话的重要基础。通过系统地梳理信息传播新模式的核心观点，我们发现信息传播新模式是以媒介中心对个体的控制为分析路径的；（2）考察信息传播新模式的应用与发展历程。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后续学者对该模式的应用与发展，虽然注意到了媒介中心与个体之间的权力转移问题，但主要还是以媒介中心对个体的控制为分析路径，已经浮现的个体控制媒介中心的现象未获得学界的足够重

视；（3）信息传播新模式的转向——控制辩证模式的提出。在大量前期分析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当下的媒介实践，我们通过引入吉登斯的控制辩证法思想，将其与信息传播新模式相结合，实现了信息传播新模式的转向，不再只聚焦于媒介中心对个体的控制，而是同步观照了个体对媒介中心的控制问题，即提出了新的、综合性的信息传播模式——控制辩证模式。

## 一、信息传播新模式

### （一）训示模式

典型的训示模式（图1）是“不存在任何反馈的迹象的”（without any sign of feedback）（Bordewijk & van Kamm, 1986/2003: 577）的。训示模式作为典型的“单向传递模式”（Jensen, 1999），媒介中心（C）掌握着信息发布的最大控制权，它可以自主决定信息的发布和信息发布的程序，个体（i）在其中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只能被动地接收（受）信息。更为重要的是，训示模式中的信息的传递存在不可逆性和时间的不可压缩性，信息一旦传送完毕，个体便失去了重新获得该信息的机会，而且个体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对内容没有取舍权，只能被动接收信息中心传递的全部信息。以例子来说明的话，电视与电视观众便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电视内容提供商决定何时播放什么节目，电视观众只能被动地接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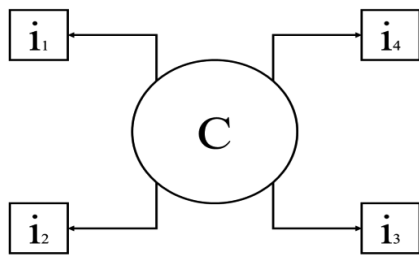


图1 训示模式（博德维克、范·卡姆，1986/2003：577）

### （二）对话模式

理想的对话模式（图2）暗示了参与对话者间的权力平衡，他们拥有同等程度的信息所有权和信息处理能力，并且参与对话的人数不能过多，否则会因为人数过多而出现对协调者的需求，因而由对话演变为“顺序性的训示”（sequential allocation）。此外，无论是通过媒介进行的对话，还是直接的面对面对话，都必须免于政治权力的干预，且隐私也能够得到保护。信息的发布和信息发布的程序等控制权都掌握在个体手中，是对话模式的主要特征。但是，对话模式并不只意味着



“传播”，其亦可指称“沉思”（meditation）——自己与自己的对话。因此，Jensen（1999）将对话模式等同于“双向传播模式”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更何况对话模式可能因为参与对话者人数过多而演变为“顺序性的训示”，亦会因个体的话语是面向公众或他人而演变为训示。又或者个体成为他人寻求信息的信息中心，而将对话演变为咨询。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对话模式中，参与者除了需要支付电话费或网费等媒介使用费外，他/她是完全不需要对对话的内容付费的。并且，对话模式中的信息服务者（C）仅是内容的传递中介，它不对内容进行任何干预，不过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它亦有可能为对话者提供自动翻译或错误纠正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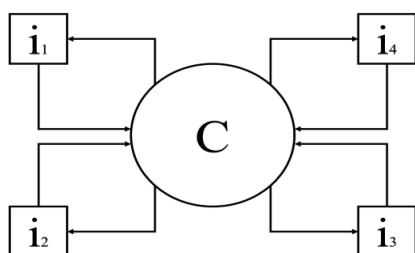


图2 对话模式（博德维克、范·卡姆，1986/2003：578）

### （三）咨询模式

较之于训示模式而言，咨询模式（图3）中的个体（i）对信息的发布程序拥有着最大控制权，他可以自由选择时间与主题，以便从媒介中心处获得他所想要的信息，此时的媒介中心仅仅作为数据库存在。比较典型的例子便是网络搜索引擎服务的使用，互联网作为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其中储存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当用户需要相关信息时，便可通过搜索引擎直接检索相关关键词，以获得所需要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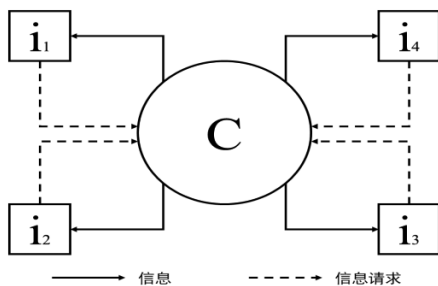


图3 咨询模式（博德维克、范·卡姆，1986/2003：579）

### （四）注册模式

数据时代的个人隐私问题日渐受到人们的关注，注册模式（图4）作为博德维

克和范·卡姆提出的四个模式中的最后一个，关注的便是媒介中心（C）对个体（i）的隐私的监视与侵犯问题。注册模式中的媒介中心，既可以是为个体提供信息传递服务的中介，亦可以是向个体提供服务的内容提供商。当媒介中心作为传递服务的中介时，它可以监视个体通过其传递的信息内容；而作为内容提供商时，它可以监视用户的媒介使用习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智能手机的大规模普及与应用更加验证了注册模式的前瞻性，因为手机之前的几乎所有媒介都不及手机这般呈现出“7×24”全天候信息记录的特性，所以手机甚至被称为了“带体温的媒介”（匡文波，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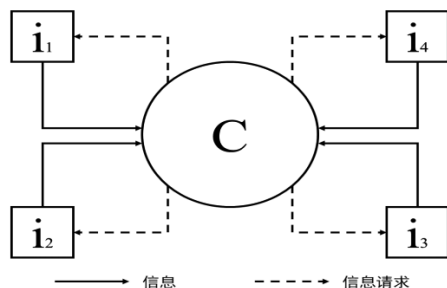


图4 注册模式

#### （五）多元模式服务与多元模式网络

博德维克和范·卡姆分别从单一媒介的角度讨论了“多元模式服务”（Multi-pattern services），从媒介融合的角度讨论了“多元模式网络”（Multi-pattern networks）两个融合模式。“多元模式服务”强调的是，一种媒介同时具备上述四种模式中的两个及以上模式，例如电话便聚合了对话模式、咨询模式和注册模式；而“多元模式网络”则强调的是不同信息服务网络聚合到一起，如三网融合，强调的是将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进行融合。

总的来看，信息传播新模式更多的只是从“媒介中心主义”和“媒介工具主义”等两个预设观照个体。（1）媒介中心主义集中体现在训示模式和注册模式两个模式上。媒介中心主义框架下的媒介用户处于边缘地位，面对来自媒介的信息流或请求几无招架之力。类似于迈克尔·德塞托笔下的“偷猎者”，他们无法进入内容生产的战略，只能被动接收信息，除了采用战术逃离这些信息中的意义的陷阱外别无良策（麦格雷，2009）。无论是将电视打开作为背景音，然后自己忙自己的“仪式化的”（Rubin,1984）媒介使用行为，还是有目的收看某个节目的“工具性的”（Rubin,1984）媒介使用行为，均未能逃离来自媒介中心对边缘的监控。

(2) 媒介工具主义则集中体现在咨询模式和对话模式两个模式上。在这两个模式之中,媒介降格为了数据库或工具,个体的地位表面上获得了提升,但实际仍然是处于媒介的从属地位。咨询模式中的个体变成了用户,却也只能被动地获取媒介中已有的数据。对话模式中的用户则仅将媒介作为“脱域机制”(吉登斯,1998)下的交流工具看待,即媒介只是联结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用户的一个中介而已,其中的隐私问题(Curran, Fenton & Freedman,2012)并未获得有效观照。套用吉登斯批判帕森斯和阿尔都塞的观点——“帕森斯的行动者是文化的呆子,阿尔都塞的行动者则是更加平庸的结构呆子”(2015:58),这些传播模式中的个体则多是“传播的呆子”,有的仅是媒介中心对个体的控制,个体对媒介中心的控制是缺位的。

## 二、信息传播新模式的应用与发展

从既有文献来看,麦奎尔和温德尔(1993/2008)是较早引介博德维克和范·卡姆(1986)的信息传播新模式的学者,Jensen(1999)、McMillan(2002)和Meikle(2002;转引自:Spurgeon,2005)则是该模式得以被学界熟知的三个关键节点(见图5)。Jensen作为三个关键节点中的核心节点,创新性地将信息传播新模式与“interactivity”(互动)研究相结合,实现了对新媒体中互动类型的区分。McMillan则在Jensen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网络互动的四分模式”(The four-part model of cyber-interactivity)。相较于Jensen和McMillan而言,Meikle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其观点较少获得学界的关注。总的来说,已有文献围绕信息传播新模式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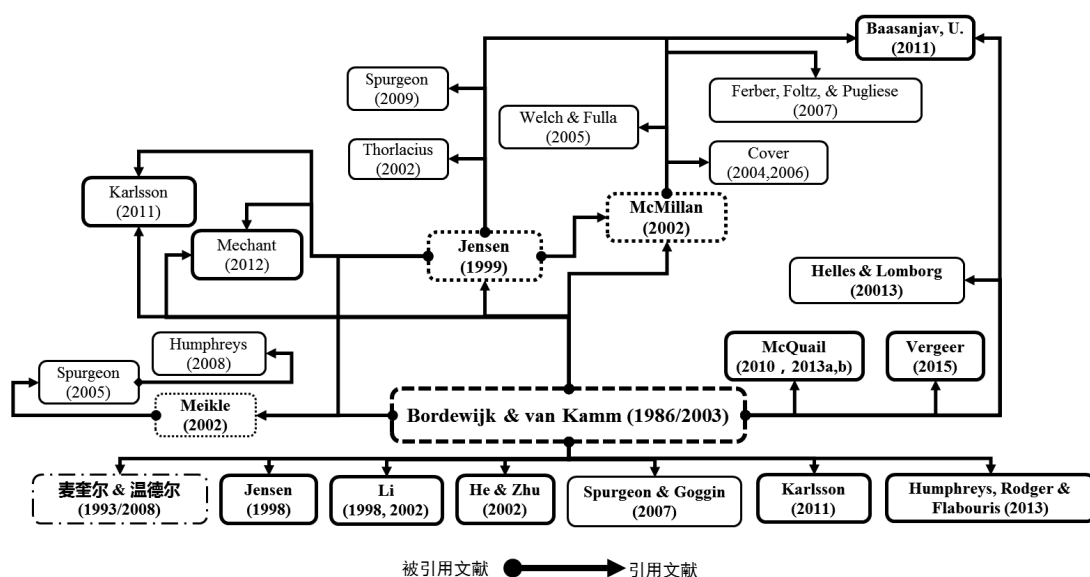


图5 文献引证路径

了四个主要的论域：一是传播模式的转换，即信息流向的重新分配问题；二是将信息传播新模式与互动概念的结合，用以说明新媒体时代中的互动问题；三是如何将信息传播新模式的四个理想类型建构成一个综合性的传播模型；四是能否或如何超越信息传播新模式。

（一）传播模式的转换

博德维克和范·卡姆（1986）早就意识到，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上述四种理想类型不断地呈现出彼此融合的态势，但是这种融合将会以失衡的状态出现。在他们（Bordewijk & van Kamm,1986/2003）看来，新媒体的发展会逐渐削弱训示模式，强化咨询模式和对话模式，然而这种局面又可能因为注册模式的井喷式发展而被改变。麦奎尔和温德尔（1993/2008）根据博德维克和范·卡姆（1986/2003）两人的观点绘制了图6，说明新媒体的发展促使了信息传播的模式从训示模式向咨询模式和对话模式的转换，从而实现了信息流向的重新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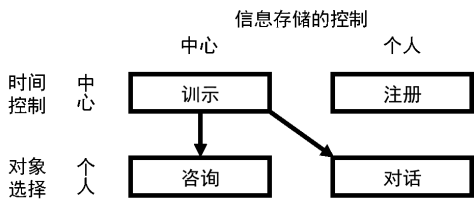


图6 麦奎尔和温德尔的传播流向结构图（1983/2008：183）

（注：原文中“训示”部分为“演讲”）

然而，在Jensen（1998）看来，随着新媒体的普及与应用，训示模式应是同时朝向咨询模式、注册模式和对话模式三种模式转换的，而向咨询模式的转换是最主要的（参见图7）。梵·迪克（2002）所持观点与Jensen的类似。网络新闻的生产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这一转换，因为网络报纸确实为这种模式的转换提供了可能，即传播的权力由传播者或信息中心向受众或用户转移（Li,1998）。但是这种转移是有条件的，它受制于个体访问新闻门户网站时的主观的“信息检索效率”（efficiency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感，即当用户能够在更多的时间内从网站获得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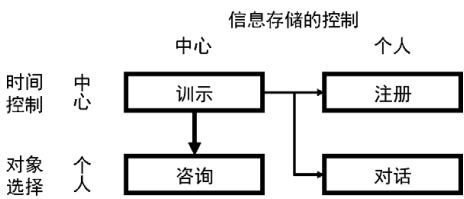


图7 Jensen的传播流向结构图

多的选择和更大容量的信息时，他的这种感觉会越高，反之则越低（Li,2002）。

## （二）信息传播新模式与“互动（interactivity）”概念的结合

虽然“互动”是新媒体研究的关键概念之一，但是关于到底什么是互动，却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Gane & Beer,2008:87-102）。Jensen（1999）为了说明什么是互动，借鉴了信息传播新模式的分析框架。他的这一举动，不仅是学界厘清互动概念的一次尝试，也阴错阳差地成为了信息传播新模式得以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契机。

Jensen（1999）借用信息传播新模式的分析框架，基于媒介的潜能将互动概念一拆为四：（1）“传递互动”（transimissional interactivity），即用户仅能从持续的和单向的信息流中截取信息，但无法进行反馈，因而也无法向媒介提出任何请求；（2）“咨询互动”（consultational interactivity），是指在带有反馈渠道的双向传播系统中，用户以请求的方式从预制的内容集合中选取所需信息；（3）“对话互动”（conversational interactivity），强调的是在双向传播系统中，用户可以同时生产、插入或存储自己的信息；以及（4）“注册互动”（registrational interactivity），即媒介登录、适应并（或）回应特定用户的需求或行动，这既可能是媒介用户的自行选择的结果，也可能是媒介智能化的结果。但是在Tremayne和Dunwoody（2001）看来，只有“咨询”和“注册”两个模式更类似于新媒体中的“互动”。

Thorlacius（2002）从网站的视觉审美传播入手，在Jensen（1999）的基础上，将“咨询互动”进一步细分为了“交易互动”（transaction）和Jensen式的“咨询互动”。这两种互动都具备双向传播的功能，但是“咨询互动”中仅有个体能获益，而“交易互动”中的媒介中心与个体均能从中受益。不同于Thorlacius创新地提出“交易互动”的传播模式，Spurgeon（2005）对Meikle将“交流互动”（intercreative interaction）（2002；转引自:Spurgeon,2005）——消费者关于广告商的品牌、商品、服务和代理人的谈话皆有益于其营销价值链——屈尊于Jensen（1999）的“对话互动”表示遗憾。在Spurgeon（2005）看来，尽管“交流互动”与“咨询互动”分享了许多共同特征，但前者完全有资格与Jensen（1999）的四种“互动模式”并列，特别是在信息传播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它甚至能成为第五种重要的互动模式。

图8系对上述观点的综合呈现。

McMillan（2002）借鉴了Jensen（1999）的研究路径，将脱胎于大众传播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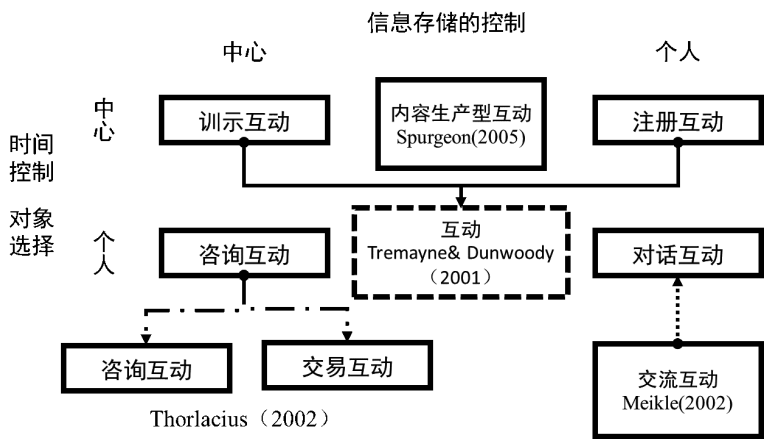


图8 基于信息传播新模式的“互动类型”结构图

传统的信息传播新模式与组织传播中“公共关系的四分模式”（Thefour-part model of public relations）（Grunig &Grunig,1989；转引自:McMillan,2002）相结合，提出了从用户视角切入的“网络互动的四分模式”（图9）。网络互动的四分模式主要包括两个维度，一个是传播的方向问题（Grunig & Grunig,1989），另一个是传播过程中的控制问题（Bordewijk & van Kamm,1986/2003）。图9中的圆圈表示个体在传播中的角色，箭头的方向和圆圈的重叠则指代传播的方向。“训示”（monologue），是指整个传播基本上全是单向传播，受众缺乏控制传播过程的能力。“反馈”（feedback）中的受众则能够以有限的参与方式参与到单向传播之中。“回应”（responsive dialogue）类似于不对称的双向模式，即双向传播虽然可能，但传播者保留了对传播过程的最大控制权。类似于对话和双向对称模式，“交流”（mutual discourse）不仅实现了双向传播，受众在其中也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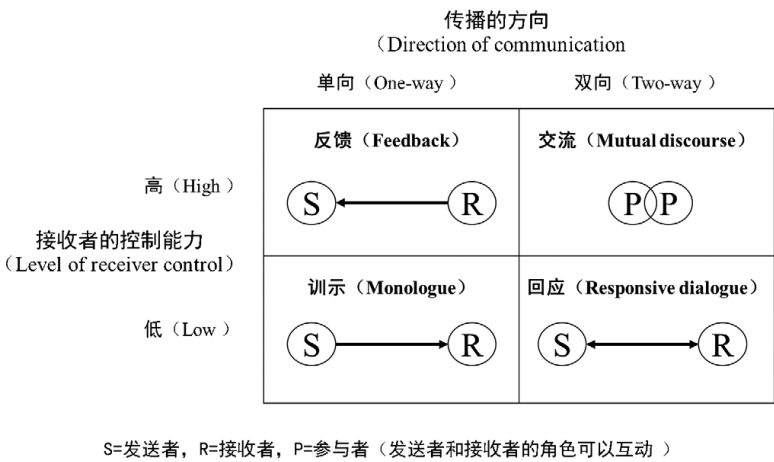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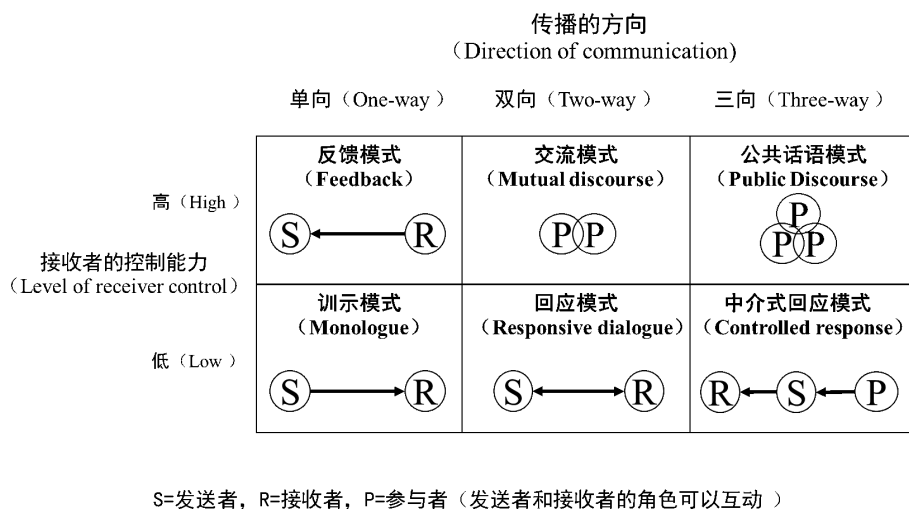


图9 McMillan的网络互动的四分模式(McMillan,2002:276)



考虑到人际传播与公共传播的差异性问题，Ferber、Foltz和Pugliese（2007）在McMillan（2002）的基础之上新增了“公共话语模式”（Public discourse）和“中介式回应模式”（Controlled response）（图10）。公共话语模式是指，在诸如网络聊天室、QQ群或微信群中，公众的发言内容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自由发布任何信息，而网络服务提供商对这些内容的过滤能力是有限的。中介式回应模式则是指网站运营商通过投票或提供电子公告板（BBS）的形式，向网络用户提供发布信息的服务，但网站运营商是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监控和过滤的。



**图10 Ferber、Foltz和Pugliese的网络互动的六分模式**  
(Ferber,Foltz & Pugliese,2007:393)

### （三）对信息传播新模式四种理想类型的综合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博德维克和范·卡姆的“多元模式服务”日渐成为现实，即“综合网络的诞生意味着单一的媒介同时聚合训示、咨询、注册，以及对话四种模式于一身”（van Dijk,2012:12）。梵·迪克对信息传播新模式的四种理想类型进行了综合，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传播模型，既“模式融合”（图11）（van Dijk，2012）。在这个模型中，地方单位的主动权与选择权和地方单位彼此之间的传播，以及地方单位与核心单位之间的传播机会均受制于传播的内容与情境，但“模式融合”更为深远的意义不在于此，而在于“人类在历史上将第一次面临这样一个抉择，即在大量的社会活动中究竟是选择中介化的互动，还是选择面对面的互动”（van Dijk，2012：12）。

### （四）超越信息传播新模式

#### 1.虚拟社区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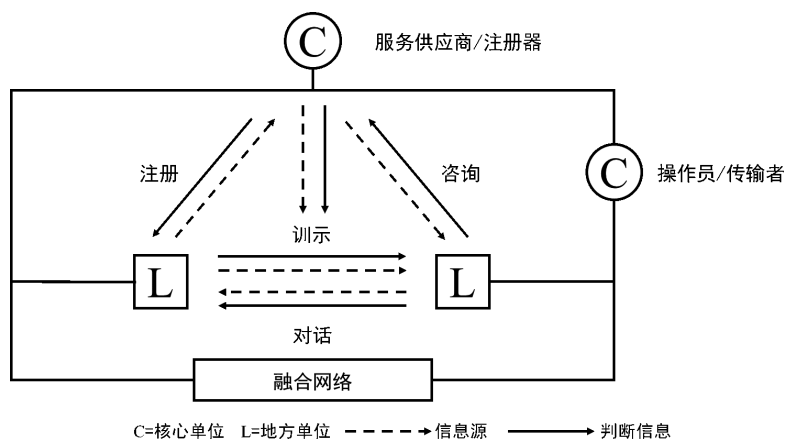


图11 网络中信息传播模式的融合（梵·迪克，2014：11）

从学理层面而言，信息传播新模式强于Bruner（1998）提出的“复写模式”（The broucherware model）、“秀场模式”（The show-biz model）和“实用模式”（The utility model）等三个模式，但两者都未落实到可操作化的层面，即提出相应的标准用以准确地测量网络传播的类型（He & Zhu，2002）。因此，He与Zhu尝试提出了适用于网络传播的“复写模式”（Broucherware）、“准互动模式”（Quasi-interactive），以及“虚拟社区模式”（Virtual Community）等三个传播模式。复写模式是指网站运营商仅是将其纸质版上的内容翻录到网络上，除供用户浏览之外不再提供其它任何服务。虚拟社区模式则主要有“（1）信息的双向传递；（2）多重的和复杂的反馈渠道；（3）多样化的服务；（4）高级的搜索服务（搜索日期、完整的文本，以及图片）；（5）成熟的导航服务，丰富的链接服务；（6）大量为网络传播生产的专门信息”等特征（He & Zhu,2002:124）。准互动模式处于复写模式和虚拟社区模式这个连续统的中间，或者说是虚拟社区模式的早期萌芽状态。在He与Zhu看来，虚拟社区模式是最适用于网络传播的传播模式，它可以被用来有效地将网络报纸区别于传统的纸质版报纸，并且是整个网络报纸的未来发展方向。

## 2.参与模式

Humphreys、Rodger和Flabouris（2013）摒弃了效用甚微的技术决定主义框架，采用信息传播新模式观照健康传播问题，以求厘清既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形式是如何建构特定媒介的“功能可见性”（affordances）和约束条件的。Humphreys等指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应用，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意识到，信息传播新模式之外的“参与模式”（Participatory mode）正作为一个新的模式崛起。在这个模式中传播者的控制权被稀释了，即发布什么内容、何时发布、怎样发布等的权力都被分

权了。遗憾的是,可能因为该模式是在健康传播的语境下提出,所以作者对媒介中心(健康专家)主导信息控制权持有肯定态度。因此,Humphreys等(2013)虽然注意到了权力关系问题,但却碍于健康传播议题的特殊性,所以未能将参与模式展开,对传播中的权力关系转换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学理论证。

Peter Mechant(2012)认为信息传播新模式在Web2.0时代的理论阐释力已然式微,因为Web2.0时代是一个参与性的和集体协作性的网络,其用户更多地参与到内容分享与生产活动中,因而他弃信息传播的新模式于一旁,另起炉灶,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框架或传播模式。

### 三、信息传播新模式的转向——“控制辩证模式”的提出

信息传播新模式从控制权的归属角度讨论了媒介中心与个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以信息发布和发布程序的控制权归属作为划分标准,将信息服务建构成了训示模式、对话模式、咨询模式和注册模式共四种理想类型。信息传播新模式更多关注的实际上是媒介中心对个体的控制问题,咨询模式中的个体虽享有信息发布程序的控制权却仅限于从媒介中心获取信息,注册模式中的个体享有的信息发布控制权更只是被动地回应媒介中心的信息请求而已。因而,信息传播新模式本身并未讨论过个体对媒介中心的控制问题。虽然学者们(麦奎尔&温德尔,1993/2008; Jensen,1998; Li,1998; Li,2002; MacMillan,2002; Mechant,2012; Humphreysetal.,2013)注意到了信息传播新模式中可能出现的权力转移问题,但是他们均未充分讨论过个体对媒介中心的控制问题。Jensen(1999)将信息传播新模式与互动概念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其它学者的想象力,使学者们(Jensen,1999; Thorlacius,2002; MacMillan,2002; Ferber et al.,2007)逐渐地意识到媒介中心与个体间的辩证关系,但是对这种辩证关系的认识还是没有推进到讨论个体对媒介中心的控制问题。

总的来说,既有的学术对话延续的还是信息传播新模式的分析路径,即在“媒介中心一个体”的权力关系中媒介中心依然主导着信息控制权。然而,在当下的语境中,这种分析路径存在若干不足之处。首先,从技术的层面来看,随着新媒体技术,尤其是Web 2.0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日益摆脱单一的大众传播功能,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信息生产、发布与交换的平台。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化媒体的普及,使得越来越多个体得以更加方便、快捷地参与到信息的发布活动之中(Delwiche & Henderson,2013:5-7),媒介中心信息控制权日渐弱化,个体信息控

制权逐渐强化，在“媒介中心一个体”的权力格局下，个体的信息发布渠道和方式已然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其对应的传播技能亦日趋成熟。

其次，从文化的层面来看，得益于新媒体技术发展的参与文化迅速崛起，使个体的主体意识不断得到强化。在Henry Jenkins及其同事看来，参与文化主要拥有“对艺术性表达（artistic expression）和公民参与的低门槛性，大力支持作品的创新与分享，允许人们以非正式的导师形式将专门知识传递给普罗大众……认为每个人都有做出其应有的贡献并被他人认可的机会”等特征（Jenkin, Purushotma, Weigel, Clinton & Robison, 2009: 5-6）。此外，参与文化还意味着权力（Jenkins et al., 2009; Kelly, 2013），因为它唤醒了个体的主体意识，也改变了个体与媒介内容间的关系（Jenkins et al., 2009），个体不再被动于媒介中心对其的建构与规训，而是积极地参与到信息的发布活动中。这种参与或是救偏补弊，或是另起炉灶，其目的就在于建立并维护已觉醒的主体意识的合法性。因而，参与文化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冲击了“媒介中心一个体”的既有权力格局。

第三，从权力关系的层面来看，新媒体的赋权功能日渐凸显，使原来等级森严的权力结构受到挑战。赋权概念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其意在“帮助个体解放自身的潜能，从而使得他们能够有效地控制自己的生活”（McLaughlin, 2016: 124）。学界有关传播技术与赋权之间的关系已多有讨论（丁未，2009；师曾志，2013；郑永年，2014；师曾志 & 杨睿，2015）。简单来说，媒介中心因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失去了信息发布权的垄断优势，从而改变了“媒介中心一个体”权力关系中原有的少数对多数的信息传播模式，传播主体多元化的格局日渐成型。此外，参与文化有效地增强了个体的思辨能力、表达能力和行动能力，从而稀释了媒介中心的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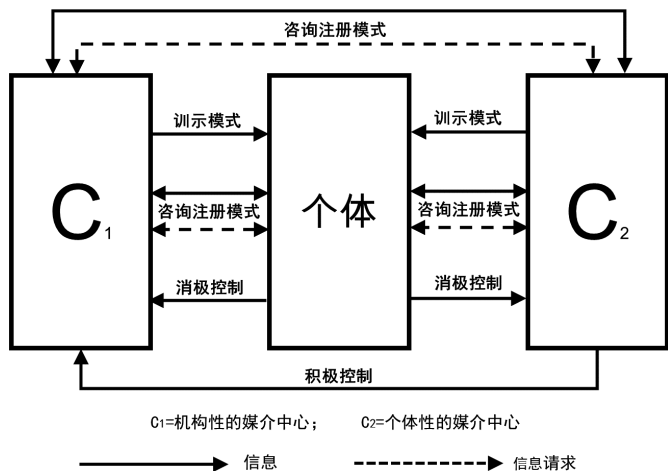


图12 控制辩证模式

与支配权力。在新媒体技术和参与文化的双重加持下，赋权的效果得到进一步彰显。因此，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参与文化的崛起和新媒体赋权功能的凸显共同构成了我们提出新传播模式的时代背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尝试引入吉登斯的控制辩证法思想，将其与信息传播新模式相结合，提出新的传播模式——控制辩证模式（见图12），以观照新的“媒介中心—个体”权力关系。

### （一）控制辩证法

李康（2012）曾将吉登斯的“控制辩证法”思想总结如下：

在社会系统中存在的权力反映出行动者之间自主与依赖的辩证关系。所有权力都是双向分布的。在既有的权力关系中，权力的弱势力无论居于多么不利的地位，都可以借助某种操纵资源的方式，对权力强势方实施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反过来，权力的强势方无论多么强大，只要仍然停留在权力关系之中，就会在某个方面受制于权力的弱势方。（李康，2012；转引自：杨善华&谢立中，2012:97）

简单来说，吉登斯的控制辩证法中的个体是具备“改变”能力的行动者，他“能够介入、干预这个世界，或是能够摆脱这种干预，同时产生影响事件的特定过程或事态的效果……能够（在日常生活流中周而复始地）实施一系列具有因果关系性质的权力，包括那些影响他人所实施之权力的权力”（吉登斯，1998:76）。自主与依赖关系是控制辩证法的核心观点。媒介中心与个体之间的自主与依赖的关系，体现在个体可以借助某种方式对媒介中心实施强大的影响。以色列驻纽约领馆前发言人梅纳车姆·夏勒夫（Menachem Shalev）的言论能够更直接说明这一问题，他说“……新闻记者、编辑和政治家们如果知道将在几小时里面接到数以千计的愤怒的电话，那么他们就要三思而后行才对以色列进行批评。犹太游说集团拿手的就是组织压力活动”（米尔斯海默&沃尔特，2009:252）。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与普及则是使这种个体与媒介中心之间的愤怒言论有变成公开的传播行为的可能，亦可能绕过已有的媒介中心直接面向其它个体进行信息的大众传播。例如，为了回应2008年CNN的失实报道，饶谨于当年3月18日注册了Anti-cnn.com网站，同年3月20日网站正式上线后的首发文章为《西藏真相：西方媒体污蔑中国报道全记录》，该文通过大量的图片和翔实的证据反驳了CNN对西藏事件的不实报道（四月网，2016）。

### （二）控制辩证模式

控制辩证模式旨在说明个体与媒介中心（C1、C2）之间和“机构性的媒介中



心”(C1)与“个体性的媒介中心”(C2)之间的控制辩证关系。“消极控制”是个体控制C1的主要手段,“积极控制”是C2控制C1的主要手段。因为咨询模式和注册模式都是指一种主动获取信息行为,所以我们将这两个模式合并为了“咨询注册模式”。咨询注册模式既存在于媒介中心与个体之间,亦是存在于两个媒介中心之间。原来仅限于个体之间媒介化互动的对话模式被发展成为个体、机构性媒介中心和个体性媒介中心之间的互动模式。本模式中的训示模式则和原有训示模式的意义相同。接下来需要重点说明的便是消极控制和积极控制,这两种控制类型及其所揭示的关系也是控制辩证模式的核心内容。此外,我们还将进一步说明本模式中的信息流向问题。

### 1.积极控制和消极控制

以赛亚·伯林(柏林,2015)曾将自由划分为“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消极的自由”是免于(freedom from)的自由,“积极的自由”则是去做(freedom to)的自由。

个体与媒介中心之间是“免于”的自由,即个体在消费了媒介中心发布的信息之后,通过各种方式向媒介中心表达自身对其发布的信息和信息发布的程序的喜欢或憎恶的行为,并希望媒介中心自身能够积极地回应这些诉求,或删改其所发布信息中的不足或偏颇之处。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媒介中心保留了对信息的发布和发布的程序的最大控制权,个体缺乏控制这些的能力,所以我们称其为消极控制。以中文维基百科中“南京大屠杀”的条目为例(黄顺铭&李红涛,2015),在整个条目的编撰活动中,涉及人数众多,不同用户围绕导言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种行为便是个体在消费了媒介中心发布的内容之后,才能产生的控制行为。

个体性的媒介中心享有的则是“去做”的自由,即个体性的媒介中心可以不受机构性的媒介中心干预,能够直接面向个体自行确立信息的发布和信息发布的程序,并在机构性的媒介中心之外形成新的话语中心,从而实现对机构性的媒介中心的积极控制。从最早的私人网(页)站到博客,再到微博,以及现在的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便是个体性的媒介中心的典型代表。对于能够成为控制辩证法中的、具有“改变”能力的个体来说,他(她)便可通过这些自媒体建构出一个独立的个体性的媒介中心,并依托后者独立自主地发声,向其它个体说明和阐明他(她)自己就某现象或问题的观点与想法。

### 2.控制辩证模式中的信息流向

信息传播新模式的信息流向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征:(1)个体被动地接受媒



介中心发出的信息。个体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只能成为媒介中心的信息高地，除了接收（受）由媒介中心发布的信息以外别无其它选择；（2）个体被动地向媒介中心传递信息。无论个体是仪式化还是工具化的媒介使用，媒介中心都会基于这些使用行为产生关于受众的“画像”，或者说是大数据，然而这些数据都是受众在不知情的情况被记录在媒介中心的，即便是看似仅是两个或多个个体间借由媒介中心实现的“对话模式”亦不能逃脱被监控的命运；（3）媒介中心被动地向个体传递信息。这种情况下的媒介中心是一个信息蓄水池，个体虽可以从中任意地获取信息，但这种“任意”仅在媒介中心可提供的信息范围内有效。控制辩证模式的信息流向除了包含上述情况外，还包括了从个体主动地、积极地向媒介中心传递信息的情况，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的个体可以像对话模式中那样，自主地选择信息的发布和信息发布的程序。消极控制是信息从个体流向机构性的媒介中心，而积极控制是信息从个体性的媒介中心流向机构性的媒介中心。

## 结语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诸如“用户生产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和“生产型消费者”（Prosumer）等概念的出现，都不同程度上说明个体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媒介中心的信息，而是可以参与到媒介中心的内容的分享与生产过程中的。自媒体的发展更是表明，个体已经不再需要依赖已经有的媒介中心才能发声的惯例，而是可以自己直接面向其它个体进行大众传播实践的。上述种种迹象表明，信息传播新模式及其后续的改进模式所用的媒介中心对个体的控制的分析路径，已然不能完整地观照当下信息传播的实践了，个体对媒介中心的消极控制、个体性的媒介中心对机构性的媒介中心的积极控制已然成为了现实。因此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个体与媒介中心、机构性的媒介中心与个体性的媒介中心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引入了吉登斯的控制辩证法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传播的控制辩证模式，希望通过此举得以为更完整地检视当下的信息传播实践提供分析框架。当然，控制辩证模式的理论阐释力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学术对话与研究实践检验。

（责任编辑：林羽丰）

## 引用文献 [References]

丁未(2009).新媒体与赋权：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国际新闻界》,(10):76-81.

[Ding, Wei. (2009). New media and empowerment: a practical social research.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10):76-81.]

- 黄顺铭,李红涛(2015).在线集体记忆的协作性书写——中文维基百科“南京大屠杀”条目(2004—2014)的个案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2(1):5-23.
- [Huang, Shunming. & Li, Hongtao. (2015). Writing online collective memory collaboratively: a case study of the entry of "Nanking Massacre" in Chinese Wikipedia.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Vol 22(1):5-23]
- 匡文波(2012).手机媒体概论(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Kuang, Wenbo (2012). *Introduction to the Mobile Phone Media (2nd Ed.)*.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李康(2012).安东尼·吉登斯.载杨善华和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Li, Kang (2012). Anthony Giddens. In Yang, Shanguhua & Xie, Lizhong (Eds), *Western Sociological Theory*. Beijing: Pei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四月网(2016).检索于<http://www.m4.cn/>.
- [The 4th Media (2016). Retrieved from <http://www.m4.cn/>]
- 师曾志(2013).新媒介赋权视阈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00):73-93.
- [Shi, Zengzhi(2013).Xinmeijie Fuquan Shiyu Xia De Guojia Yu Shehui Guangxi.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Review*. (00):73-93]
- 师曾志,杨睿(2015).新媒介赋权下的情感话语实践与互联网治理——以“马航失联事件”引发的恐惧奇观为例.《探索与争鸣》,(01):41-44.
- [Shi, Zengzhi.& Yang, Rui(2015). Emotional Discourse Practice under Empowerment of New Medias and Internet Governance: The Case of Fear Phenomenon Caused by Malaysia Airlines Lost Contact Event.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01):41-44]
- 郑永年(2014).《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北京:东方出版社.
- [Zheng, Yongnian (2014).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Beijing: The Orient Press]
- 周晓虹(2002).《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Zhou, Xiaohong (2002). *Western Sociology: History and System (Vol.1)*.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埃里克·麦格雷(2009).《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刘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Maigret, Éric.(2009). *Sociologie de la communication et des medias (Trans.)*. Beijing: Press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 安东尼·吉登斯(1998).《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Giddens, A. (1998).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Tran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安东尼·吉登斯(2015).《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社会分析中的行动、结构与矛盾》(郭忠华、徐法

- 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Giddens, A. (1998).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 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2008).《大众传播模式论(第2版)》(祝建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McQuail, D. & Windahl, S. (2008). *Communication models for the study of mass communications (2nd Ed.)(Trans.)*.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 简·梵·迪克(2014).《网络社会:新媒体的社会层面(第2版)》(蔡静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Van Dijk, J. (2012).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 (Trans.)*. Beijing: Tsinghua Press]
- 以赛亚·伯林(2015).《自由论》(胡传胜译).江苏:译林出版社.
- [Berlin, I (2015). *Liberty (Trans.)*. Jiangsu: Yilin Press]
- 约·J·米尔斯海默,斯·M·沃尔特(2009).《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王传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Mearsheimer, J. J., & Walt, S. M. (2009).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Baasanjav, U. (2011). Web-use patterns for civic discourse: the case of Mongolian organization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4(5), 591-618.
- Bordewijk, J. L., & Kaam, B. v. (2003). Towards a new classification of tele-information services. In N. Wardrip-Fruin & N. Montfort (Eds.), *The New Media Reader*. MIT Press.
- Cover, R. (2004). New media theory: electronic games, democracy and reconfiguring the author-audience relationship. *Social Semiotics*, 14(2), 173-191.
- Cover, R. (2006). Audience inter/active Interactive media, narrative control and reconceiving audience history. *New Media & Society*, 8(1), 139-158.
- Curran, J., Fenton, N., & Freedman, D. (2012). *Misunderstanding the internet*. Routledge.
- Delwiche, A., & Henderson, J. J. (2013). Introduction: what is participatory culture? In A. Delwiche & J. J. Henderson (Eds.), *The Participatory Cultures Handbook* (pp. 3-9). Routledge.
- Ferber, P., Foltz, F., & Pugliese, R. (2007). Cyberdemocracy and online politics: a new model of interactivity. *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27(5), 391-400.
- Gane, N., & Beer, D. (2008). *New media: The Key Concepts*. Berg.
- Grunig, J. E., & Grunig, L. S. (1989). Toward a theory of the public relations behavior of organizations: review of a program of research.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1(1-4), 27-63. 转引自: McMillan, S. J. (2002). A four-part model of cyber-interactivity. *New Media & Society*, 4(2), 271-291.
- He, Z., & Zhu, J.-h. (2002). the Ecology of Online Newspapers: The case of Chin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4(1), 121-137.
- Helles, R., & Lomborg, S. (2013). Regulatory response? tracking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ical

- developments on privacy regulation in Denmark from 2000 to 2011. *Policy & Internet*, 5(3), 289-303.
- Humphreys, S. (2008). Grassroots creativity and community in new media environments: Yarn Harlot and the 4000 knitting Olympians. *Continuum: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22(3), 419-433.
- Humphreys, S., Rodger, D., & Flabouris, M. (2013).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medium in the control and flows of information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Asia Pacific Media Educator*, 23(2), 291-307.
- Jenkins, H., Purushotma, R., Weigel, M., Clinton, K., & Robison, A. J. (2009).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s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 Media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 MIT Press.
- Jensen, J. F. (1998).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fter the Mediasaurus?. *Nordicom Review*, 19, 39-52.
- Jensen, J. F. (1999). Interactivity: tracking a new concept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Nordicom Review*, 19(1), 185-204.
- Karlsson, M. (2011). The immediacy of online news, the visibility of journalistic processes and a restructuring of journalistic authority. *Journalism*, 12(3), 279-295.
- Karlsson, M., & Clerwall, C. (2013). Negotiating professional news judgment and “clicks” . *Nordicom Review*, 34(2), 65-76.
- Kelty, C. M. (2013). From participation to power. In A. Delwiche & J. J. Henderson (Eds.), *The Participatory Cultures Handbook*(pp. 22-31). Routledge.
- Li, X. (1998). Web page design and graphic use of three US newspaper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5(2), 353-365.
- Li, X. (2002). Web page design affects news retrieval efficiency.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23(1), 38-49.
- McLaughlin, K. (2016). *Empowerment: A Critique*. Routledge.
- McMillan, S. J. (2002). A four-part model of cyber-interactivity some cyber-places are more interactive than others. *New Media & Society*, 4(2), 271-291.
- McQuail, D. (2010). *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6<sup>th</sup> edition)*. Sage publications.
- McQuail, D. (2013a). The media audience: abrief biography—stages of growth or paradigm change?.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16(1-2), 9-20.
- McQuail, D. (2013b). Reflections on paradigm change in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7, 216-229.
- Mechant, P. (2012). An illustrated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Web2. 0 interactivity.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7(3), 263-281.
- Meikle, G. (2002). *Future active: media activism and the Internet*. New York: Routledge.转引自:Spurgeon, C. (2005). Losers and lovers: mobile phone services advertising and the new media consumer/producer. *Journal of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5(2), 47-55.

- Rubin, A. M. (1984). Ritualized and instrumental television view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4(3), 67-77.
- Spurgeon, C. (2005). Losers and lovers: mobile phone services advertising and the new media consumer/producer. *Journal of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5(2), 47-55.
- Spurgeon, C. (2009). From mass communication to mass conversation: Why 1984 wasn't like 1984. *Austral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6(2), 143-158.
- Spurgeon, C., & Goggin, G. (2007). Mobiles into media: premium rate SMS and the adaptation of television to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cultures. *Continuum: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21(2), 317-329.
- Thorlacius, L. (2002). A model of visual, aesthetic communication focusing on web sites. *Digital Creativity*, 13(2), 85-98.
- Tremayne, M., & Dunwoody, S. (2001). Interactivity,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learning on the World Wide Web. *Science Communication*, 23(2), 111-134.
- Van Dijk, J. (2012). *The network society (2<sup>nd</sup> Ed.)*. Sage Publications.
- Vergeer, M. (2015). Peers and sources as social capital in the production of news: online social networks as communities of journalists.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33(3), 277-297.
- Welch, E. W., & Fulla, S. (2005). Virtual interactivity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The Chicago Police Department's citizen ICAM application demonstration ca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2(2), 215-236.